

量远远不象过去庞大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这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地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

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残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

(一) 抗战期间在华北的暴行

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推荐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时说“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赤裸裸的恐怖真

象。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

雷震远神父在书中讲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 13 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刽子手连续挥动了 13 次钢刀，砍下了 13 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

善忍，是这场罪恶与荒谬能够发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

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灭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

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功，镇压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进行这场注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款、发行国债(国库券)和诱惑海外投资来维持。

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全，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

中共和江泽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法轮功，为镇压和迫害制造借口。然而纸包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信誉，失去了民心。

江泽民在 1999 年镇压法轮功之初，曾打算“三个月”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量。

自古邪不压正，邪恶是不能从人们的心中“铲除”善良的。五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仍然是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江泽民和中共却在这场正邪较量中大败，也将其自身的流氓、残酷和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江泽民现在声名狼藉，内外交困，正在面临清众多的法律起诉和要求清

量远远不象过去庞大得动辄以百万、千万计，但是实际上这出于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民被中共的党文化异化得更加犬儒；另一个是中共由于巨额贪污和盗用国库已经造成“输血型”经济，外资成为维持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共对“六四”之后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深知此时明目张胆地杀人会导致外资撤离，从而危及其统治。

但是中共背地里却没有停手，只是在极力掩盖血污。

二、杀人手段极其残忍

中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和维持权力。而杀人就成了其维持权力的重要手段，方法越残忍、人数越众多，才越能够恐吓人民，而且这种恐吓是早在抗战时期甚至以前就开始的。

(一) 抗战期间在华北的暴行

美国总统胡佛向全世界推荐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时说“在这本书里揭露出共产主义在行动上赤裸裸的恐怖真

象。我愿向那些希望切切实明了弥漫在全世界上的这个魔鬼势力的全国人士们，推荐这本书。”

雷震远神父在书中讲述了一些中共如何用暴行恐吓民众的故事。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广场上去，小孩子们则由他们的老师领着，目的是让他们观看 13 个爱国青年是如何被砍头的。在宣读了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后，中共命令已经吓得脸色发白的教师领着小孩子们高唱爱国歌曲。在歌声中出场的不是舞蹈演员，而是一个手持钢刀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凶狠结实的年轻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来到第一个牺牲者后面，双手举起宽大锐利的大刀快如闪电般的砍下，第一颗头应声落地，在地下滚滚转，鲜血像涌泉般喷出。孩子们近于歇斯底里的歌声，变成了不协调杂乱的啼叫声。教员们想打着拍子将喧嚣的音调领上秩序，杂乱中我又听到钟声。”

刽子手连续挥动了 13 次钢刀，砍下了 13 颗人头，随后中共的士兵们一

善忍，是这场罪恶与荒谬能够发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

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

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灭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

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功，镇压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进行这场注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款、发行国债(国库券)和诱惑海外投资来维持。

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全，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

中共和江泽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法轮功，为镇压和迫害制造借口。然而纸包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信誉，失去了民心。

江泽民在 1999 年镇压法轮功之初，曾打算“三个月”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量。

自古邪不压正，邪恶是不能从人们的心中“铲除”善良的。五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仍然是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江泽民和中共却在这场正邪较量中大败，也将其自身的流氓、残酷和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江泽民现在声名狼藉，内外交困，正在面临清众多的法律起诉和要求清

理、法办与绳之以法的呼声。

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颗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

结语

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江泽民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整人手段、运动机制而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

忍，仇视法轮功，其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泽民和中共在打击“真善忍”时，使假、恶、暴、毒、邪、腐败等乘机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

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也绑在了一起。法轮功正在起诉江泽民，当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中共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

对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好人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泽民和中共的恶行，也将给人类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训。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入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

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四）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

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储安平等都是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

“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

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

理、法办与绳之以法的呼声。

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颗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

结语

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江泽民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整人手段、运动机制而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

忍，仇视法轮功，其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泽民和中共在打击“真善忍”时，使假、恶、暴、毒、邪、腐败等乘机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

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也绑在了一起。法轮功正在起诉江泽民，当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中共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

对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好人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泽民和中共的恶行，也将给人类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训。

【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入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

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四）从文革、“六四”到法轮功

文革是从1966年的5月16日正式开始的。这段时间被中共自己称为“十年浩劫”，胡耀邦后来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了这样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而专家根

据中国县志记载的统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人。

除了打死人之外，文革开始时，中国出现了自杀高潮，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吴晗、储安平等都是文革初期走上绝路的。

文革时期是中国“左倾”最疯狂的时期，此时的杀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展示“革命性”的表演，因此对“阶级敌人”的虐杀就极其残酷和野蛮。

“改革开放”却使信息流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海外很多记者也因此得以在北京目睹了1989年的“六四”血案，并将坦克追着将学生压成肉酱的屠城录像在海外电视台播出。

十年之后，江泽民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2年年底的时候，大陆的内部消息即指有超过7000人在各地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和精神病院被折磨致死，平均一天虐杀7个人。

如今的中共似乎杀人数

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

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祸首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大”。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

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

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教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这个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

110

83

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

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祸首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大”。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

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着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

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教化却起着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这个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

110

83

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 1949 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

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分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据 1996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 32 万 3 千 1 百余人被逮捕，280 余人自杀或失踪；在 1955 年“反胡风运动”中，有 5 千余人被牵连，5 百余人被逮捕，60 余人自杀身亡，12 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 2 万 1 千 3 百余人被判死刑，4 千 3 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三) 大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 1994 年 2 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 4 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 4 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 3 千万到 4 千 5 百万之间。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

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

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 1949 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

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什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分子潜移默化，影响巨大。

据 1996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 32 万 3 千 1 百余人被逮捕，280 余人自杀或失踪；在 1955 年“反胡风运动”中，有 5 千余人被牵连，5 百余人被逮捕，60 余人自杀身亡，12 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 2 万 1 千 3 百余人被判死刑，4 千 3 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三) 大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 1994 年 2 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 4 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 4 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 3 千万到 4 千 5 百万之间。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

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

“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中共公布到 1952 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 240 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 500 万人以上。

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

杀运动。

“三反”是从 1951 年 12 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杀运动。

“三反”是从 1951 年 12 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命，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魔”，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分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命，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魔”，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

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

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二) 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

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辨”，《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

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

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一) 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

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分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象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

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二) 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

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辨”，《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

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

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一) 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

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借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分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

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从 1949 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至今唯有共产党认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

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言之，早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

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三) 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

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

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它；它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它“伟大光荣正确”；知识分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它的应声虫儿；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

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式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

并且在中共建政后什么也没做，一样要处死，因为他属于“历史反革命”。在土改过程中，中共甚至有时会采取“斩草除根”的灭绝方式，除了杀地主之外，连地主的家人都要一起杀掉。

从 1949 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六千万到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与世界上其他共产国家一样，中共不但大肆屠杀民众，对其内部也进行血腥清洗，其手段也极其残酷，目的之一就是清除那些“人性”战胜了“党性”的异己分子。它不但需要恐吓人民，也需要恐吓自己人，以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文化中充满了人与人的关怀和爱，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神的感恩。东方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人说“要爱人如己”。至今唯有共产党认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维持一

个“斗”字，就要在人民中煽动仇恨，不但中共自己要杀人，还要挑动群众互相杀。让人民在不断的杀人中学会漠视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痛苦，在种种非人的残忍暴行面前，变得习惯与麻木，使得侥幸逃过暴行成为最值得庆幸的事，从而使中共的统治可以凭借残酷镇压得以维系。

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言之，早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

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文化分庭抗礼，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三) 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

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

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它；它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它“伟大光荣正确”；知识分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它的应声虫儿；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

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式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

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它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

（四）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

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

（一）三教齐灭

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

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

唯有中共，三教齐灭。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

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

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儿，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

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

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它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

（四）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

包含着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着“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

（一）三教齐灭

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

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

唯有中共，三教齐灭。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

共在强化其地位，维护其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处理经济危机（建政后物价飞涨、文革后经济几乎崩溃）、政治危机（有人对党不服从，有人要和党分享政治权利）、信仰危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事件、法轮功事件）的过程中，采取的必然反应。除了法轮功事件外，前面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是给中共邪灵充电、焕发革命斗志的过程，也是党的组织检阅，凡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党员都被淘汰出局。

同时共产党杀人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儿，中间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从表面看，很多时候中共是“被动杀人”，好像是社会上一件“偶然”事件“偶然”地触发了中共邪灵和中共组织的杀人机制。其实，掩藏在“偶然”后面的周期性杀人对中共来说又是一种必然，否则，“好了伤疤忘了

疼”，过两年不杀人，人们就会产生中共已经改良的错觉，甚至像那些八九民运的理想青年一样扑上去要民主。七、八年杀一次人，就可以不断刷新人们对恐怖的记忆，也可以警示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跟共产党作对，谁想挑战中共的绝对领导，谁想试图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谁就要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从这点来说，杀人是中共维系统治最必要的手段之一。在血债越欠越多的情况下，放下屠刀就等于把自己交给民众清算。因此，中共不但要杀人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而且要使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尤其是在建政初期，非如此不能震慑民众。

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从来都是使用“群体灭绝”政策。以“镇压反革命”为例，中共并非镇压反革命“行为”，而是镇压反革命“分子”。即使一个人只是被抓丁当了几天国军，

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

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前言

中共建政 55 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六千万至八千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 11 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

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

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

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的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分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

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 年 5 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 8 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

“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

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

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

【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前言

中共建政 55 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六千万至八千万的无辜生命，以及更多的破碎家庭后，很多人仍然在想：中共为什么要杀人？当今天中共仍然在屠杀法轮功，甚至 11 月初还在汉源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时候，许多人也在想：

中共是否有一天会停止杀人，学会用嘴说话，而不是用枪说话。

毛泽东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说白了，就是七、八年再来一次运动，七、八年再杀一批人。

共产党杀人是有其理论根据和现实需要的。

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信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因此在建政后，它采取“杀地主”的办法解决农村的生产关系；“杀资产阶级”完成工商改造，解决城市的生产关系。这两个阶级的杀完，经济基础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也要靠杀人来解决，包括镇压“胡风反党集团”和“反右”以整肃知识分子；“杀会道门”解决宗教问题；“文革杀人”解决文化上和政治上党的绝对领导权问题；“六四”杀人逃避政治危机，解决民主诉求问题；“迫害法轮功”解决信仰和健身运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中

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 年 5 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 8 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

“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

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灭法方式
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

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

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

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

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五万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三分之一，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蹿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们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

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8名婴儿因这种

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八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

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们的腾飞已经明证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

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誉于

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灭法方式
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

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

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

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

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五万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三分之一，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蹿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们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

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8名婴儿因这种

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八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

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们的腾飞已经明证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

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誉于

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

“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 50 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 5000 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结语

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的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是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关系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

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

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

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 1958 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三万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两万四千八百人。”（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静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

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词。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

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 1950 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关进监狱二十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

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

“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 50 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 5000 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结语

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的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分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是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关系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

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

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

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 1958 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三万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两万四千八百人。”（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静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

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词。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

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 1950 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关进监狱二十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

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

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做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自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场』，里面曾有二万五千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

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三）破坏文物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92

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期称为“解放战争”，好像是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了出来；把1949年以后称为“建国以后”，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

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

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

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

101

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

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做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自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场』，里面曾有二万五千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谬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

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三）破坏文物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92

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期称为“解放战争”，好像是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了出来；把1949年以后称为“建国以后”，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

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

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

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

101

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3、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

4、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

“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个大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被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

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

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

同时中共还创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它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

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它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四) 精神层面的摧毁
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

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

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

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

(五) 破坏无远弗届

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

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3、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

4、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

“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个大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被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

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

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

同时中共还创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它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

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它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四) 精神层面的摧毁
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

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

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

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

(五) 破坏无远弗届

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

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

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 改造知识分子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

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开展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分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

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4、谎言文化

“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

5、洗脑文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6、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

7、走过场的文化

一个接一个地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还干什么，所有的

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

(三) 人际关系方面

1、嫉妒文化

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椽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

(四) 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

1、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

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2、颠倒是非的文化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二十年的

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

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 改造知识分子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

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开展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分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

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4、谎言文化

“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

5、洗脑文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6、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

7、走过场的文化

一个接一个地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还干什么，所有的

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

(三) 人际关系方面

1、嫉妒文化

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椽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

(四) 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

1、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

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2、颠倒是非的文化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二十年的

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

3、网络控制文化

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

4、株连文化

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

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炼（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炼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

(二) 文宣方面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青、妇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

2、鼓吹暴力文化

“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3、煽动仇恨文化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

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压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分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

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

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章不知是计，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应邀”发表的言论。

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

3、网络控制文化

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

4、株连文化

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

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炼（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炼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

(二) 文宣方面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青、妇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

2、鼓吹暴力文化

“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3、煽动仇恨文化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

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分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压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分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

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

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章不知是计，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分子“应邀”发表的言论。

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 55 万之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

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七) 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

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

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它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

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的文善恶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

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

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

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

(一) 统治方面

1、封闭文化

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

2、恐怖文化

共产党五十五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

这些知识分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 55 万之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分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

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七) 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

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

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它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三、党文化

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的文善恶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

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

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

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

(一) 统治方面

1、封闭文化

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

2、恐怖文化

共产党五十五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